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苏关系始末

孙其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　　序

大约从80年代初开始，我便涉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此后，逐步发展，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苏关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萌生出写一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史的愿望。幸运的是，1993年我就此课题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了批准。尽管资助的经费并不多，却大大地促进了我的研究工作。几年来，我在紧张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搜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其中包括历史文献、回忆录、专著和论文等等。在此基础上，我和我的两位同事边研究、边写作，终于将这部50多万字的书稿写了出来，圆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梦。

在今天的中国，凡50岁以上的人都亲身经历过40年中苏关系的风云变幻。我生虽晚，新中国成立初也已进校读书，因而也同上了年纪的许多人一样，亲眼目睹了两国关系的大起大落。从50年代的“一边倒”和“蜜月”般的友好合作，到60年代初的激烈论战；从“文革”时期的“反修狂潮”，到80年代两国重新握手言和，其间发生的件件大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我辈虽非外交官，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起伏，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也曾像海浪一样波动。50年代，苏联曾是我孩提时代心目中的“天堂”，我曾为自己选学俄语而庆幸，甚至幻想过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大学深造；60年代，我则为苏联“变修”而惋惜，也曾为我国高举“反修”大旗而自豪，为中央发表“九评”叫绝；“文革”时，我曾同千万学子一起，投身于“反修防修”的大潮之中，大批特批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也曾为“社会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而义愤填膺；80 年代，我亦开始“反思”，却似乎越想越感到往事难以理解……这样的思想和感情的变化虽说是我个人的，实际上却有极广泛的代表性。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又有谁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变化呢！由此可见，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中苏关系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对外关系，它的起伏之大，它对中国影响之深远，它与普通百姓关系之密切，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如果撇开感情因素，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苏关系也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由于影响中苏关系的因素太多，既同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又受两国国内形势的制约；既有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又夹杂着现实的利害冲突；既取决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既受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又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性格紧密相连，因此，与其他的双边关系不同，中苏关系显得十分特殊，又十分复杂。照理，对如此重要，又如此特殊、复杂的对外关系，学术界应当特别重视。十几年来，也确有一些学者作了很好的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一些亲历者也写出了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回忆录。然而，总的来说，研究中苏关系远不如研究中美关系那么“热”，所出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不尽如人意，对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至今还是“空白”。诚然，中苏关系已成为历史，似乎与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关系不大，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过去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中，人们无疑可以汲取许多极为重要、极为有益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中苏关系淡忘。

因为有了上面的这些想法，我才下决心要为中苏关系的研究做一点工作，努力把这本书写好。不过，有决心是一回事，实

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对我来说，研究中苏关系，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课题，而且也受到种种条件限制，故困难自然很多。为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书写得好一点，我把本书的重点放在描述40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全过程上，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切忌感情用事；而对40年间的是非恩怨，学术界至今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一时难作判断的问题，则暂不妄加评论。这样做并非回避矛盾，只是为了更加科学而已。我亦不妄自菲薄，尽管写出来的东西也许水平不高，可我自信这本书仍是迄今为止国内系统反映40年中苏关系发展全过程的第一部专著，如能早日出版问世，至少能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上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的第一至第四章均由我本人写出初稿并修改定稿。徐筠、张劲则为第五章提供了初稿和部分资料，最后也由我根据全书的统一要求改写、定稿。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吸取了许多研究者的成果，也利用了他们提供的资料，在此，谨向所有给我们帮助的人表示谢意。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的注释采用脚注。不过，为了节省篇幅和便于读者查阅，凡本书引用过的著作的目录都附在书末；这些著作的排列则以本书引用的先后为序。

孙其明

1998年7月于同济大学

目录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

一、介入中国的最初尝试（3）

从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成立谈起——西方不亮东方亮，列宁的战略转变——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及中国革命的援助——中国革命掀起新高潮——在胜利和成功之中孕育着严重的危机——莫斯科的指导出现失误——面对失败，斯大林文过饰非

二、援助与控制并存（21）

莫斯科提出新政策——第一次“左”倾盲动的由来——斯大林亲自开导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的直接干预——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毛泽东在山沟里崛起——李立三在太岁头上动土——必须让真正忠于莫斯科的人掌权

三、莫斯科的最后选择（42）

所谓的国际路线——红色中国的严重危机——长征路上的“政变”——共产国际七大的新方针——“远方”斥责西安事变——“钦差大臣”从天而降——莫斯科终于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66)
暂时的“和谐”与“一致”——前所未有的争执——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共产国际”成为历史名词——“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不光彩的角色
五、渡尽劫波,重叙友情(91)
斯大林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莫斯科在中国东北的“两面政策”——全面内战爆发,苏联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创造奇迹,斯大林改变政策——米高扬秘密访华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刘少奇访苏为中苏新关系奠定基础

第二章 “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

一、新同盟的诞生(117)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与“一边倒”——毛泽东首访莫斯科——“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周恩来应召赴苏——废旧约,订新约——差强人意的中苏新同盟
二、第一次考验(145)
一场有国际背景的内战——金日成发出求援急电——“总不能见死不救”——周恩来秘访苏联,斯大林突然变卦——毛泽东破釜沉舟,照原计划出兵援朝——中苏同盟受到的第一次考验
三、堪称慷慨的援助(162)
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恢复——周恩来三访莫斯科,争取新的援助——斯大林与世长辞——漫长的谈判终于结出硕果——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有苏联

的一份功劳
四、赫鲁晓夫的新姿态（179）
一颗“新星”在升起——苏联最高级代表团首次访华——送给中国的又一份“厚礼”——赫鲁晓夫说，苏联的援助并不是“无私的”——真正“平等”的关系
五、全面合作与全面学习（194）
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50年代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毛泽东等人号召全面学习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评所谓的“全盘苏化”

第三章　裂痕的产生和扩大

一、苏共二十大激起千层浪（213）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中共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裂痕的产生和中苏关系恶化的滥觞
二、波匈事件与中苏扯皮（242）
米高扬访华与中共八大——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苏联政府的宣言和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共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周恩来出访苏、波、匈三国与中苏扯皮
三、群星会聚谁最亮（284）
北京隆重接待伏罗希洛夫意味着什么？——赫

鲁晓夫在内部权力争斗中反败为胜——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今非昔比的第二次访苏——毛泽东发表非同寻常的讲话——莫斯科会议和《莫斯科宣言》的得与失——“友好合作”的新进展和中苏联手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

四、风云突变的1958年 (328)

令人不快的长波电台事件——“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赫鲁晓夫匆匆忙忙飞到北京——毛泽东炮击金门、马祖又给莫斯科出了难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引发新的风波

五、无可挽回的“逆转” (366)

还要不要以苏联为首——苏方片面取消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印边界冲突和莫斯科的所谓“中立”——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求爱”——不同的国际战略——不欢而散的最高级会谈——毛泽东得出结论：苏共领导人已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第四章　大论战导致大破裂

一、从初次交锋到暂时妥协 (405)

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上不和谐的声音——《列宁主义万岁》指桑骂槐——布加勒斯特的初次交锋——赫鲁晓夫落井下石——不寻常的中央工作会议——《莫斯科声明》与中苏之间的暂时妥协

二、苏共二十二大又起风波 (437)

赫鲁晓夫恶化苏阿关系，杀鸡给猴看——苏共

召开二十二大，周恩来拂袖而去——苏阿断交和中苏对立——鲜为人知的新疆逃亡事件——你来我往，终于导致激烈的公开论战
三、流产的两党会谈（463）
真能停止公开论战吗——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独木桥式”的两党会谈——从“声明战”到洋洋数万言的苏共中央公开信——火上浇油的“三国条约”
四、“九评”——大论战的“重磅炮弹”（490）
中国决心彻底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共中央发表“九评”，打出批判“苏修”的“重磅炮弹”——莫斯科再次要求“停战”，遭到北京拒绝——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新争执——要不要召开新的国际会议
五、赫氏下台与两党关系中断（528）
苏大使深夜求见，报告赫氏下台的惊人消息——为谋求关系缓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访苏——柯西金访华受到毛泽东接见——莫斯科悍然召开分裂会议，北京开始大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新争吵——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从此中断

第五章　从“势不两立”到关系正常化

一、中苏关系跌入谷底（565）
苏联对中国施压和中国掀起“反修怒潮”——捷克事件与“社会帝国主义”——昔日的“兄弟”在珍宝岛大动干戈——中苏两国关系跌入谷底——迫在眉

睫的“战争危险”和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
二、既“对话”,又“对抗” (608)
马拉松式的聋子对话——持续不断的对抗与纠纷——北京、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三角关系——从“两大阵营”到“三个世界”——周恩来、毛泽东逝世与苏联的“幻想”——中苏同盟条约的终止与国家关系的谈判——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三、“冰雪”开始融化 (649)
8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与中苏关系的松动——副外长级磋商的恢复和中国正式提出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吊唁外交”对打破坚冰起了重要作用——阿尔希波夫访华,中苏关系逐渐由“冷”变“热”
四、走向关系正常化 (665)
戈尔巴乔夫上台,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出现新势头——姚依林回访莫斯科——邓小平递口信,敦促戈氏加快步伐—— 戈氏发表海参崴讲话,中国迅速作出积极反应——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和“三大障碍”开始消除
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682)
最后最大的一个障碍:柬埔寨问题终于获得新突破——两国外长互访,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作准备——中苏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苏联解体后,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确保中俄关系等继续正常地发展
参考书目 (705)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介入中国的最初尝试

从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成立谈起——西方不亮东方亮，列宁的战略转变——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及中国革命的援助——中国革命掀起新高潮——在胜利和成功之中孕育着严重的危机——莫斯科的指导出现失误——面对失败，斯大林文过饰非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中苏关系走过了40多年的曲折道路，直到苏联解体为止。时间虽然不长，但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却由来已久。尚在襁褓之中，中共便同莫斯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后，这种联系更是进一步发展，并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成败，对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关系的演变，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建国后的中苏关系，必须首先对建国前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作一历史的回顾；而要说明建国前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从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成立谈起。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对邻近俄国的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东欧、中欧和南欧的许多国家也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人民起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欧洲革命高潮。此外，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

世界性革命浪潮的出现，特别是欧洲国家革命运动的高涨，反过来极大地鼓舞了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使列宁深深感到：进一步推动革命潮流的发展，将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结合起来，不但是俄国无产阶级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对巩固俄国革命的胜利有好处。列宁甚至认为，只有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俄国革命的成果才能真正得到巩固。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便开始考虑筹建无产阶级政党新的国际组织。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列宁就认为，第二国际因其主要领导人完全沦为修正主义者而在实际上已经死亡，各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考虑建立新国际的问题。不过，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前，由于条件尚未成熟，列宁关于创建新国际的主张未能实现。1917 年之后，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各国纷纷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列宁认为创建新国际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因而立即将创建新国际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1918 年 1 月，由列宁和俄共（布）中央提议，由欧美部分国家共产主义者派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会议酝酿和讨论了建立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

问题，但没有就此作出明确的决议。同年 11 月德国革命爆发后，列宁觉得有必要加快筹建新国际的进程，俄共(布)中央随即于 12 月间向有关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发出一份建议迅速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1919 年 1 月，筹备建立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列宁关于尽快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提议，并决定以苏俄、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等国共产党人的名义，向世界 39 个共产党、左派社会党的团体和组织发出邀请书，要求他们派代表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经过俄共(布)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1919 年 3 月 2 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如期在莫斯科开幕。来自欧、美、亚洲 21 个国家的 35 个组织，共 52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代表俄共(布)中央致了开幕词，并在会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该报告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会代表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列宁的报告，并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章程草案》、《共产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大会还选举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选举俄国共产党人季诺维也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完成了创建共产国际的任务。代表大会于 3 月 6 日结束。大会结束后，列宁立即在莫斯科大剧院隆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的被称为“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的国际共产党正式诞生了。

共产国际召开成立大会时，中国还没有共产主义的组织，更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自然不可能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不过，仍有两名中国人参加了大会，一名叫刘绍周，一名叫张永奎，两人均为侨居俄国的旅俄华工联合会的负责人，与中国国内的组织并无任何联系。然而，正是这个一开始似乎与中国关系不大的

共产国际，后来却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列宁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为的是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欧洲推广俄国革命的经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在列宁看来，已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革命形势，而共产国际的成立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欧美各国革命的爆发，并领导这一革命取得成功。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列宁与共产国际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发动和领导欧美各国的革命上。尽管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不断高涨，但列宁和共产国际却重视不够。

然而，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出乎列宁的意料。在共产国际成立后一年多时间里，欧洲虽然确有不少国家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一度出现过革命的高潮，但是除俄国以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未能获得胜利。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并未像在俄国那样得到巩固，都在襁褓中被资产阶级扼杀了。就整个欧洲而言，革命高潮也成了昙花一现。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在克服了短暂的危机之后，又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欧洲革命潮流的消退，促使列宁逐渐把目光转向东方。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相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在继续高涨。这不能不引起列宁的注意，使他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新希望。

列宁以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西方不亮东方亮。西欧各国的革命有可能会沉寂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在东方，以反帝民族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革命运动，却有可能进一步勃兴。列宁认为，不

论是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运动，打击的对象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都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有利。因此，既然西方各国一时难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苏俄和共产国际应当更多地关注东方各国人民的斗争。

有鉴于此，当 1920 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列宁迅即行动起来。他亲自为大会起草了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并领导大会认真讨论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这表明，列宁决心抓住时机，改变苏俄和共产国际忽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倾向，全力促进占世界人口 70％的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参加到反帝斗争中来。

列宁关于世界革命战略的转变得到了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赞同。也正是在这一新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开始直接介入中国，逐步地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自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初，大英帝国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法国、美国、沙俄、日本等西方列强便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对中国肆意侵略，对炎黄子孙毫无顾忌地进行剥削和奴役，将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列强的野蛮行径，终将激怒有着数千年反压迫传统的中华民族。因此，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广州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斗争到义和团的反帝起义，从改良的变法维新运动至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的斗争浪潮一个接一个，从未停止过。不过，所有这些斗争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侵略势力，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状况。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但震撼了整个世界，也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树立了榜样；它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中国人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觉醒。1919 年 5 月，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引起苏俄和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并促使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派人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者建立联系”。与此同时，苏俄政府还于 1919 年 7 月间发表了一份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的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亦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已决定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

接着，1920 年 4 月间，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布）党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维经斯基一行首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此时已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同维经斯基等人谈得十分投机。交谈不仅使李大钊对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况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也使维经斯基得到了有关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知识。当维经斯基建议中国的进步分子立即考虑筹建中国的共产党组织时，李大钊告诉他，对于这样的大事，应当去上海找陈独秀商谈。

维经斯基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旋即南下，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通过在老渔阳里 2 号陈独秀寓所内的多次密谈，陈独秀和他在上海的追随者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们毫无保留地赞同维经斯基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